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三卷

1854年1月—1854年12月

著 作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设计:尹凤阁 王师颌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常再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
ISBN 7-01-002530-4

I. 马…
II. 中…
III. 马恩著作-全集
IV. A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2757 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十三卷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0 月第 2 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33.5 插页 10

字数:85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01-002530-4/A·227 定价:56.00 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
局编译的。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 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 《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前 言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4 年 1 月—12 月所写的 87 篇文章。文章的绝大部分发表在美国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其中一些文章作为社论发表,许多文章还转载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专刊《纽约半周论坛报》和《纽约每周论坛报》上。部分文章发表在英国宪章派报纸《人民报》上。

1854 年,反动政治势力继续统治着欧洲,革命的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处于低潮,革命报刊遭到查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已经不可能公开正面地阐述自己的革命理论,只能利用资产阶级进步报纸,通过对当时各种重大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来宣传革命思想、鼓舞群众和影响社会舆论。马克思一家移居英国以后,长期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极端窘迫,为报刊撰稿对于维持家庭生活也有所帮助。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撰写通讯文章同理论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们注意收集有关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的资料,认真地进行分析,因而他们所写的通讯往往受到舆论界的高度评价。同时,撰写通讯也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积累了材料,充实了研究的基础。马克思在 1854 年重新审阅和整理了过去所作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并且写下了《货币、信用、危机》手稿。恩格斯主要从事

军事问题的研究,撰写这方面的通讯。

本卷所收的政论文章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各门科学的研究成果,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文章内容比较丰富,主要涉及当时欧亚两洲发生的重要政治、军事事件(如克里木战争和西班牙起义),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以及英国工人运动等等。

1853年爆发的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军事冲突在1854年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英国和法国的介入,这一冲突演变为英法和土耳其为一方同俄国为一方之间的战争,即克里木战争,又称东方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关注这场战争,撰写了大量文章,分析战争的原因和性质,评述战争各个阶段军事行动的进程,揭露各国统治阶级在战争期间的幕后外交活动,并且阐述了他们对克里木战争的立场。

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认为沙皇俄国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和支柱,因此他们在分析克里木战争背景和参战各国外交活动的一系列文章中总是首先集中揭露沙皇俄国妄图吞并土耳其进而称霸欧洲的野心。他们指出,沙皇政府要求维护居住在土耳其境内的基督教徒的宗教权力,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是想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独霸统治,迫使土耳其政府听从沙皇的摆布。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通过剖析沙皇向西方强国暗示的共同瓜分土耳其的计划,揭穿了沙皇的阴谋诡计,指出沙皇的真实目的是在摧毁土耳其的现存统治权力之后,利用他同这个国家的正教会的关系以及同斯拉夫人的关系攫取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样,沙皇“将得到牡蛎肉,而西方各国政府则不得不满足于牡蛎壳。”(见本卷第213页)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揭露了英法统治阶级帮助土耳其抵御

俄国的伪善面貌。他们指出,英法两国政府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其目的只是想要削弱沙皇这个与英法争夺巴尔干半岛和黑海控制权的竞争对手。英国政府在帮助土耳其的幌子下,不断在政治、军事、财政等各个方面加强对土耳其的干涉,这种干涉的结果只会加速土耳其帝国的崩溃。法国政府对俄宣战则是出于波拿巴的殖民主义立场和为了摆脱国内面临的危机。因此,他们认为,克里木战争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宗教争执”,或“自由和专制”的斗争,而是欧洲列强争夺私利的斗争。马克思在《希腊和土耳其。——土耳其和西方强国。——英国小麦销售量的缩减》一文中写道:“土耳其人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西方盟友,不信任他们和敌视他们。土耳其人开始把法国和英国看作是比沙皇本人更危险的敌人,下面这两句话反映了一种普遍看法:‘他们要推翻苏丹和瓜分帝国,要把我们变成基督教居民的奴隶’。”(见本卷第 246—247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英法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秩序、财产、家庭和宗教”,根本无意彻底摧毁沙皇俄国这个反动支柱,只想通过局部冲突削弱俄国的军事力量,因而他们总是力图使战争局限在一定的地区范围之内,千方百计防止战争规模的扩大,唯恐战火蔓延到整个欧洲。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和欧洲民主运动利益出发确定了他们对克里木战争的立场。他们继续坚持 1848 年革命时期的策略,希望战争能够发展成具有全欧规模的反对沙皇俄国的战争,而这种战争将成为“其他更激烈的、更有决定意义的战斗的序幕,即欧洲各国人民反对那些目前胜利的和自以为巩固的欧洲专制暴君们的战斗的序幕。”(见本卷第 655 页)在两篇《欧洲战争》、《战争》和《战况的进展》等文章中,他们明确地表述了关于通过革命战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实现欧洲民主改造的思想。恩格斯形象地把沉寂已久的欧洲

革命比作欧洲五大强国之外的“第六强国”。他表示深信,这个“第六强国”将对战争的发展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在一定的时刻,它将会“以其永葆青春的活力粉碎旧的欧洲强国及其将军们的一切计划”,“宣布它对全部五个所谓‘大’强国的统治并使它们个个战栗。”(见本卷第8页)

恩格斯具有广博精深的军事知识。克里木战争爆发后,他注意观察战争的进展,研究参战各国发布的官方消息、报刊上的通讯报道以及从私人信件中获得的情报资料,及时写出有关战争全局和一些重要战役的评述,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华。本卷收入的军事评论文章,连同前后几卷关于克里木战争的文章,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恩格斯时刻注意分析交战双方的作战方式和兵力对比。虽然不可能及时获得这方面的准确情报,但是通过综合性的分析,他仍然能够对某些军事行动的发展提出正确的预测和估计,甚至能够核实某些片面夸张的消息。

恩格斯对参战各国军队尤其是英国军队的状况进行了考察。他在《英国军队的现状及其战术、服装置备、军需部等等》一文中批评英国军队指挥管理部门存在许多严重弊病:领导不集中、实行买卖军官衔证书制度、训练制度和操典陈旧等等。他认为产生这些弊病的原因在于军队的领导墨守陈规,顽固坚持僵硬不变的制度,而英国政体的寡头性质更加重了这种制度带来的恶果。恩格斯通过对俄国军队的分析说明了国家的发达程度以及所处的环境对军队编制和作战方法的影响。他在评论法国军队时,指出了“御用军队”的危害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来十分重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在革命遭受挫折、资本主义暂时繁荣稳定的年代,他们认为这项工作对提高

人民群众的认识尤为重要。他们结合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生活所写的许多文章,从各种角度对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同时,他们也在文章中表明了自己对工人运动和革命的民主运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立场。

马克思根据英国政府官员被迫向议会公布的他们同俄国沙皇政府之间的秘密信函以及“蓝皮书”中收入的资料和外交文件,对英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秘密的外交函件的往来》等文章中,马克思指出,英国政府的这些秘密外交文件一方面暴露了英国统治阶级对沙皇俄国的卑躬屈节和阿谀逢迎态度,另一方面也揭穿了英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背信弃义,英国政府不仅对沙皇俄国明目张胆的侵略意图采取纵容姑息态度,而且暗中同沙皇政府磋商瓜分土耳其的阴谋计划。针对英国政府“希望维持土耳其帝国”的谎言,马克思尖锐指出:“如果在瓜分土耳其的后面没有潜伏着对法战争,而在对法战争后面没有潜伏着革命,那么女王陛下政府会像哥萨克陛下一样把土耳其苏丹吞掉。”(见本卷第175—176页)

本卷收入的马克思评论英国政治制度的文章主要有:《蓝皮书。——2月6日的议会辩论。——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联军舰队的行动。——爱尔兰旅。——关于工人议会的召开》、《议会辩论》、《议会的战争辩论》、《奥地利—普鲁士条约。——5月29日的议会辩论》等。马克思曾亲自旁听英国议会的辩论,对英国议会活动的特征有深刻的了解。他指出,议会中对各项政策问题的争辩都是为了装饰门面,欺骗群众。实际上,议会的两个派别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在两党轮流执政的制度下,“每个党都宁愿让自己的政敌保持接替自己执政的能力,而不愿互相破坏政治‘声誉’,使统治阶级

的统治彻底垮台。”(见本卷第 62 页)马克思引用老科贝特的话揭穿了议会的实质,说议会只是对付国内沸腾着的激烈情绪的“安全阀”(见本卷第 316 页)。在评论议会关于战争问题的辩论时,他还批判了英国自由贸易派代表人物科布顿和布莱特等人在议会中鼓吹的“和平论”,说他们是企图以假仁假义的伪装掩盖英国政府的对外掠夺政策。

英国的财政在这一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国库空虚,赤字庞大。为了弥补赤字,当时的财政大臣格莱斯顿提出了提高所得税税率等一套增加国库收入的措施。马克思在《不列颠的金融。——普雷斯顿的骚动》、《不列颠的财政》等文章中,对英国内阁的财政政策进行了抨击,指出联合内阁的财政政策完全适应它的外交政策,提高所得税的税率就是炮击公众的钱袋,把战争重负转嫁到普通群众的身上。

在研究英国财政问题的同时,马克思注意到欧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开始出现不景气现象。他在文章中描述了英、法、奥地利等国的经济状况:工商业普遍停滞、企业破产倒闭、对外贸易缩减、失业人数增加等等。根据对欧洲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的研究,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指出 50 年代初期短暂的经济繁荣之后出现的萧条现象预示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到来。他在《不列颠的财政》以及 1855 年初发表的关于英国工商业危机的一些文章中清楚地阐述了这一正确预见。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同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建立了联系,移居英国以后,这种联系更加密切。他们不仅为宪章派报刊撰稿,还参加了宪章派的一些活动。1854 年,宪章派领袖琼斯等人为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恢复宪章运动倡议召开工人议会,以便讨论成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马克思积极宣传琼斯等人的建议,

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报道工人议会情况的文章。马克思认为，不管工人议会的直接成果如何，这样一个议会的召开本身就标志着工人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工人议会邀请马克思作为名誉代表出席会议，马克思虽然没有能够亲自出席，但他寄去了一篇祝词《给工人议会的信》，信中分析了英国社会的阶级对立状况，阐明了英国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并向英国工人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见本卷第 134 页）

马克思在一些文章中评述了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国的政策。他分析了法国实行对外侵略政策的根源，指出法国的国家信用面临崩溃，内部动荡不安，波拿巴为了摆脱困境，不得不求助于对外战争：“不是国内革命就是对外战争——他别无其他选择。”（见本卷第 109 页）马克思认为，法国统治阶级不加考虑地增发国债和提高赋税必将引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即使战争能使波拿巴在国外赢得一定威望，结果也很可能加速他在法国统治的崩溃。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德意志两个大邦普鲁士和奥地利给予巨大的关注。他们对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采取摇摆不定的中立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中立政策是不能持久的，随着战争的进展，普鲁士和奥地利随时可能改变自己的政策，或者站到俄国一边，或者站到英法和土耳其一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普鲁士和奥地利是否参加战争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德意志大邦中一个也没有参加战争，战争将局限于地区性的冲突，“它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在 1792 年以后看见过的那种欧洲战争。”（见本卷第 7 页）

马克思尤其注意研究奥地利的对内对外政策，因为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占有重要的有利的地位。他在《东方战争》、《奥地利的破

产)等文章中具体分析了奥地利的财政状况。奥地利在1854年已经濒临破产边缘,虽然屡次发行公债,强行勒索,企图解决通货贬值的问题,然而财政状况并未得到改善,政府不得不转而依靠银行,以致银行变成了帝国的“真正主宰者”(见本卷第119页)。马克思指出,正是国内的财政困难决定了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期间的立场:一方面,它为了自己的利益反对俄国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和吞并土耳其,因为这将损害它的贸易,并会引起帝国内斯拉夫人的骚动,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不能听任俄国受到严重的削弱,因为这会使哈布斯堡王朝失去一个能帮助它跳出最近的革命漩涡的朋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虽然奥地利帝国经济困难,在它统治下的意大利和匈牙利境内潜藏着人民起义的危机,但它仍是不可轻视的,它拥有一支使交战双方都感到敬畏的军事力量,如果它能加入西方同盟,战争将会演变为整个欧洲反对俄国的战争,从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打开广阔的前景,有利于欧洲的民主改造和受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

马克思深切同情饱受奥地利统治之苦的匈牙利和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他指出,奥地利帝国的生存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完全依靠对匈牙利和伦巴第的占有和掠夺,只要失去匈牙利和伦巴第,它的破产就不可避免。同时马克思批判了意大利某些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民族利己主义:“奥地利帝国长寿的秘密就是这种狭隘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使每个民族陶醉于幻觉之中,以为牺牲其他民族的独立就可以为自己争得自由。”(见本卷第242—243页)

在《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黑山》、《宣战。——关于东方问题的历史》等文章中,马克思追溯了东方纠纷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并且说明了欧洲各国统治者如何利用宗教纷争

夺在东方的影响。对东方问题的深入探讨,使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看法:“波拿巴的篡位是现在东方纠纷的真正根源。”(见本卷第 71 页)马克思反对欧洲列强瓜分或吞并土耳其,然而与欧洲某些政治家相反,他并不主张保存封建的奥斯曼帝国。他认为,奥斯曼帝国是衰老的欧洲制度的基石,阻碍着欧洲的进步,作为欧洲国家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必将走向灭亡。

1854 年,西班牙国内经济状况恶化,反动势力横行霸道。这一切激起了人民的不满情绪,由此爆发了 1854—1856 年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这次革命运动,在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中详细报道了运动的进展,分析了运动的性质和前景。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马德里的起义。——奥地利—土耳其条约。——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瓦拉几亚》、《西班牙的革命。——希腊和土耳其》、《无聊的战争》、《东方问题。——西班牙的革命。——马德里报刊》、《西班牙的革命。——博马尔松德》等。马克思还进一步研究了 19 世纪上半叶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组文章《革命的西班牙》。

马克思关于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在本卷占有重要地位。根据对西班牙历史的研究,马克思揭示了西班牙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他认为,西班牙建立君主专制比较早,但长期保留地方自治,中央集权制迟迟不能生根,这是有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的。“在欧洲其他大国里,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作为社会统一的开创者而出现的……在西班牙则恰恰相反,贵族政治虽趋于衰落,却保持着自己的最恶劣的特权,城市虽已丧失自己的中世纪的权力,却没有得到现代城市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见本卷第 510 页)在西班牙,君主专制建立

后,城市工商业不断衰落,国内交换逐渐缩小,地方独立性日益增强。不仅如此,君主专制还尽力阻碍由全国性的分工和国内交易的多样性所产生的共同利益的发展,使统一的管理体系和统一的法律原则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说:“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只有纯粹表面上的相似,其实,它应该列入亚洲的政体。西班牙和土耳其一样,仍旧是共有—个挂名君主的一批治理不善的共和国。”(见本卷第 510 页)

在批驳沙多勃利昂的《维罗那会议》一书对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指责时,马克思指出,各国人民反对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具有共同的规律性,只是由于种族、国家、语言、风俗习惯等等的不同,往往带有各自特殊的色彩。马克思认为,西班牙的特殊历史背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使西班牙革命具有的一个主要特色就是:“革命要想获胜,它本身就必须以王位追求者的身分出现。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要采取两个敌对王朝利益的斗争形式。”(见本卷第 583 页)因此,革命运动胜利以后,很快就会出现复辟。然而复辟的后果又将是矛盾的激化,以至毫无妥协的可能,最终必然导致—场新的革命。这种多次的反复表明了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复杂性和持久性。

马克思指出,西班牙革命的另一特点是革命运动必须同民族解放斗争相结合。他在谈到西班牙革命领导机构中央洪达的使命时强调说,任何政治机构,如果不能把保卫国家的现实和迫切任务同西班牙的社会改造、民族精神的解放结合起来,它就必然垮台。同时,马克思揭示了西班牙反对波拿巴斗争的矛盾性质,指出“所有反法的独立战争都具有复兴性质和反动性质相结合的特点,但是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西班牙表现得那么明显。”(见本卷第 516 页)这种两面性进一步加深了西班牙革命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充分肯定西班牙人民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他热情地描述了西班牙人民如何自发地开展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和在斗争中表现出的令人难忘的生命力。他专门研究了广大群众参加的游击战争,总结了游击战各个阶段的特点。同时他也注意到当时西班牙人民仍然把摆脱痛苦的希望寄托在政府的更换上,在政治上还没有达到要求亲自参与领导抵抗运动的觉悟水平。

通过对西班牙革命领导机构、领导成员和 1812 年宪法的分析,马克思说明了西班牙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局限性。马克思认为,中央洪达是一个组织得十分粗糙、内部暮气沉沉、以一些旧时代的活化身为首领的政权机构,它行动无力,不能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1812 年宪法尽管具有限制王权的进步倾向,但这部宪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却是保持西班牙对殖民地的统治,并且在宪法中还存在着对教权派横行时期的黑暗传统实行妥协的明显迹象。

马克思在论述西班牙革命的文章中继续阐发了必须重视团结农民的思想。西班牙农村居民落后保守,不了解斗争的意义,对革命运动往往采取消极旁观的态度。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现象在西班牙这样一个古旧风俗的仓库里是不足为奇的,不能因此而忽视争取农民的任务。他总结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屡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仅仅限于“城市革命”(见本卷第 581 页),没有把农民的利益和城市的运动结合起来,从而脱离了基本的人民群众,严重削弱了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注意到西班牙 1854 年起义中出现的一些明显特点: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力量比以前大大提高,工人不再轻易受骗上当,街垒战重新显示出强大威力等等。但是根据对西班牙经济、政治、社会情况和几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马克思认为,“现代意义

上的社会问题在西班牙这样一个资源尚未开发、人口也很稀少的国家中是谈不上的。”(见本卷第 488 页)后来,在总结 1854—1856 年的革命运动时,马克思确信“下一次的欧洲革命将发现,西班牙已经成熟到能够同它合作。”(见《西班牙的革命》)1868—1874 年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预言。

本卷收入的文献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相应时期有关卷次收入的文献增加了 13 篇,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 9 篇:《不列颠的金融。——普雷斯顿的骚动》、《俄国军队》、《欧洲战争》、《土耳其战争》、《关于欧洲战斗的消息》、《军舰和堡垒》、《革命的西班牙——九》、《(A)中央洪达》、《战况的进展》;附录 4 篇:《科堡家族》、《民众情绪的不同特点》、《发现得太晚了》、《工人议会纲领》。原收入第 1 版的《巴拉克拉瓦》一文,经考证不是马克思写的,未收入本卷。《英国资产阶级》一文,还不能确认是马克思撰写的,也未收入本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3 卷翻译或重新作了校订。